

眼前的玻璃仿如旧时的颜色，
水若迷离亦澄明。

风拂过眉尖的夏，
影影绰绰。

玻璃禅

陈纸 / 著

B
O
L
I
C
H
A
N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 2014 — 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玻璃禅

陈纸 / 著

B
O
L
I

C
H
A
N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玻璃禅 / 陈纸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5. 12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ISBN 978-7-219-09683-3

I. ①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2704 号

责任编辑 白竹林 曾蔚茹
责任校对 林晓明
美术设计 李彦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2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9683-3/I · 1838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插入裂缝的一柄短刀

——关于小说创作的片言只语

(代自序)

美国作家雷蒙德·卡佛有一句话：“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，写普通事物，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；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，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”——这样的创作观让我怦然心动，也让我的周身泛着寒意。这几年来，当我提起笔要写小说，就有一种寒意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表现人性当中的那种“黑”与“暗”，我认为，这是让我们产生悲剧和痛苦的永远根源，我病态地迷恋这个。我知道，这可能与我做过记者有关。我尽量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，写普通事物，把“广阔而惊人的力量”，以及“温暖”和“光亮”，留给比我更坚强、更乐观的读者。

有一天，翻阅旧杂志，集中地，在1980—1981年的《世界文学》上，读到了几个有意思的短篇小说，它们是：法国作家亨利·特罗亚的《最好的顾客》《凡尔赛归来》，匈牙利作家久·莫尔多瓦的《会说话的猪》《遭殃的机关》，意大利作家阿·莫拉维亚的《梦游症患者》《想象》，土耳其作家阿·涅辛的《逼疯》，印象最深的，是匈牙利作家久·莫尔多瓦的六个“一分钟小

说”，篇篇精彩，入木三分。读到这些短篇小说，我恨自己的废话太多，恨自己的小说写得太长，想把不必要的东西坚决去除掉，力求做到海明威所谓的“只露冰山一角”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在创作小说时，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重要：结构和语言重要；为何写？写什么？也重要；作家的生活面有多广、知识面有多大、眼界有多宽、境界有多大、懂的有多少，所谓花鸟虫鱼、吃喝拉撒、琴棋书画、人情世故、道佛基督等“信息”层面的东西，更重要。

有时，什么都想好了，就是因为没有想好如何才能写成一个短篇而迟迟没有动笔——无论如何，都要写成一个“短篇”，成了我写小说前面临的最大考验。发表了八十余篇小说，仅有四五次，没有把持住，“不小心地”，把短篇小说写成了中篇小说。为此，我不感到欣喜，反倒感到沮丧。

本来以为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够短、够凝练了，但读了迪诺·布扎蒂不足五千字的《鲨》，顿觉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失色。小说《鲨》中的每一个句子，每一个词语，都像一柄柄尖利的短刀，密密实地插入象征财富、权利、爱情、厄运、疾病、死亡、幸福、好运的意象中，让人生未揭示的秘密，隐隐透着光亮，仿佛在遥远的地方，呼唤着什么，而人，始终选错时机。小说透过这只鲨身上永远互相矛盾的种种，诠释了人的一生。

句子做到简短、洗练、朴实无华；用词做到独到、巧妙、含蓄。尽量把人物间物理上的距离缩小缩小，把人物心理上的内在结构无限地撑大。找准互为映照对方的生存境遇，以此为切入口，让人性在人物身上发生复杂而斑驳的交织，渲染出物质与精神、身体欲望与心灵、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碰撞和撕裂。让人感到，在城乡的天空下，有爱的真挚与做人的尊严。面对生活的不公和环境的恶劣，仍旧葆有向上生长的力量，葆有对爱情神圣和纯洁的向往。或者，让小说像一柄短刀，撬开一道窄门，那是一条让读者通向心灵的隧道。——从我发表的长篇小说《下巴咒》《逝水川》以及前两部中短篇小说集《天上花》《少女为什么歌唱》，到这部集中的这些小说的要旨和内容，多是如此。

构思了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十几年，一旦要动笔了，却小心翼翼，特别是第一句话，更是处心积虑。当我写到两三百字时，就大抵知道这个小说是成了，还是败了。于是，更加不敢停笔，生怕这口“气”断了。有时，写到喘不过气来，恨不得让时光舒缓一点，让自己的体力、精力不要减下来，我希望这口气的力量也不要减弱，不要。我要让它保持一种飞扬的状态，一直勇猛向前，让它在最高峰戛然而止。

时时间问自己：我一年会读多少个中篇和长篇？为什么微型小说比中长篇小说受欢迎？读者真的是蠢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吗？非要把话写“绝”吗？因此，我就愈加要把短篇小说看得“短”而“小”，我千方百计地，把“长”的东西奋力压缩，放在尽量“小”的空间里。在下笔之时，我花很多时间想小说的结构：如何把几块玻璃像多棱镜一样地打开来；如何把无限“长”的时间和无限“大”的主题，放在最“小”、最“短”的空间和时间里。我相信：在很小很小的篇幅里，表达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是可以做到的。

不知怎的，当我以一种游戏的心理，对自己说：要写一个有趣的、有意思的小说时，我就会用一种轻松的、无所谓的心态去创作。创作完之后才发现，它的每一个情节、每一个细节、每一句话，甚至作品的主题，都比以前貌似认真创作的小说要严肃、严谨和严密。

现在想来，我大多数小说是在我以前困顿、痛苦时灵魂活跃的产物，当我的生活安逸舒适时，反倒写不出小说了。我不由得问自己：以前小说里呈现的那些困顿与痛苦，到底是人物形象的，还是我自己的？

阅读时，我总是分外留心小说中，那些夹在叙述与描写之间的、不经意甩出的一两句议论的句子。它们有如闪烁的珍珠，是作家智慧的结晶，显露出作家聪明的程度、深刻的程度，有的，甚至决定了作品品级的高低。

我始终相信：没有哪一部小说不是来源于生活，而又真正高于生活的；一部好的小说来源于我的生活，也来源于你们的生活。

库切的《迈克尔·K和他的时代》，齐诺瓦·阿切比的《崩溃》，这两部

小说都写到了非洲文化。《崩溃》篇名来源于叶芝的一句话：“一切都崩溃了，价值已再难持守，世界上到处弥漫着混乱。”齐诺瓦·阿切比在《崩溃》中，写的是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崩溃。我的意思是：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、同情和理解，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。一个作家的成功涉及很多方面，有个人成长、价值尺度等内部的，还有宗教、文化观念等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这些显文化或隐文化的东西，都综合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作用。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现代性与传承性文化的融合时期，能否在文化语境上寻求创作上的突破，是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关键。

艺术创作源于现实，高于现实，最后须回归现实。回归现实，实际上就是回到常识。我现在创作小说时，更多的，是注重所写的对象和细节，是不是符合“常理”“科学”，经典的作品不会违背这些，《红楼梦》不会，达·芬奇也不会。

我所有与小说创作有关的言论与话语都是不可信的，我真正想说的、要说的，全部在我的作品里。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001 / 一 线
014 / 松风阁
026 / 高雅颂
043 / 莲池币
052 / 城里的月光
065 / 刚果的羊
077 / 鱼生之名
086 / 屏 蔽
098 / 玻璃禅
110 / 大道朝天
122 / 布老虎
135 / 名 字

- 149 / 放 空
165 / 笑步吟
178 / 安魂曲
190 / 闯入者
202 / 灯火银河
215 / 道路纪
225 / 凶 器
237 / 母 仪
251 / 阑 尾
261 / 蒙面考
273 / 隔 离
283 / 二字诀

古时，大街上，阳光，灿烂如金，在瓦当与瓦当之间，激喘。身边，行人如织，盛世华衣，映亮城池。几张织布机，一家缝纫店，和着人语与市声，在空中，如流水一样，悠悠飘飞……

邓若兰从梦境中醒来，是在下岗的第二天。

两天前，她从工作了整整十年的谭市纺织厂退了下来，不过，是清退，听说，厂里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。十年前，她母亲刘秋云也是从那里退了下来，她在做了整整三十年的纺织工人，在岗位上光荣退休了。

邓若兰从顶替母亲进入谭市纺织厂第一天起，就下定决心，要做得像母亲一样好。她仿佛从母亲身上接过了那份心情、那份气质、那份经历。她坚定：她的人生，也会像母亲一样，密密实实、眼花缭乱、忙忙碌碌、顺顺畅畅，有头有尾地走下去。

不想，这根拉了十年的纱线，咔嚓一声，在这里断了。

起初，邓若兰没有太在意，她当时从容地走在车弄

里，那根纱线断的时候，邓若兰与它只有两米的距离，她在经历了十万次、百万次那样，快步走上去，灵巧地接上了。

厂长目睹了邓若兰接线的全过程。邓若兰就是在厂长的眼皮底下接上那根纱线的。那根纱线断的时候，厂长刚好经过那里，那根纱线就断在厂长的眼皮底下，厂长的眼皮眨了一下，睫毛一闪，那根纱线就断了，就像琴弦，嘣的一声，好像是厂长使的力。那根纱线，把厂长的步伐打乱了，厂长前走也不是，后退也不是，脚步一时定在了那里。他的脸色被眼皮和睫毛拍打了一下，由深黄变成了浅红，脸上松弛的肌肉，慢慢地收拢了。

邓若兰向厂长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机敏地闪过他的身子，把那根纱线灵巧地接上了。

整个过程不到五秒钟，好像厂长的眼皮眨了一下，睫毛一闪，那根纱线就接上了，他的身子，很快地，淹没在绵长、缜密的织布声中了。

直到厂里通知说要改制，要裁员，邓若兰也没有太在意。她根据直觉判断，最先裁掉的可能是那些年纪大的，而自己，三十三岁，正是黄金时期，论能力，自己也拿过两次厂里的“劳动模范”和一次市里的“三八红旗手”，就是把厂里所有的人都裁掉，也轮不到我——她有时在心里有点内疚地这样想。

邓若兰一点也不在意自己，她心里只有不忍，不忍与她一起在机器的声响中跑来跑去的姐妹，不知谁要走，谁走她都不舍，这种感觉，只有在亲戚朋友去世时才有，可她不想在厂里有，不想那么快就有。

有一天，蒙蒙细雨中，邓若兰从电单车上，看见两顶白帽子，一高一低，像淋湿的云一样，沉沉的又有点急地向她跑过来。她们跑了五六米，她才看清，“白帽子”是她同车间的两个工友。高个子工友跑在前面，矮个子工友拼命追赶，矮个子一直努力地把雨伞向前伸，想为高个子工友打伞，因为有风，或者是跑出了风，雨伞斜斜的，歪着脖子，雨水像断了的线一样，从伞沿斜斜地、慌慌地飘落下来。高个子工友双手捂在帽子上，她的脸撞上了邓若兰的脸，矮个子工友的伞也撞了上来，把邓若兰和高个子两个遮了起来，高个子工友右手用力一挥，那把伞像一只软弱的风筝，轻轻翻了两个跟斗，躺在了地上。矮个子工友不去捡伞，而是也把双手捂在帽子上，盯着高个子工友看。

高个子工友拉住邓若兰的车头喊：他妈的就我们三四个人好欺负，说我们工作不努力，放他妈的狗屁！矮个子工友在一旁拼命点头，她头上的帽子

由白色变成了灰色，软绵绵地贴在毛发上。邓若兰看她的脸湿漉漉的，说：快把伞捡起来，不要淋湿了。

雨越下越大，由蒙蒙细雨改成滴答作响了。矮个子工友不理她的话，一把抓住邓若兰的手，高个子工友放了车头，跑到车后面，去推邓若兰，还喊：我们找厂长评理去，问问他，我们什么时候少站了一分钟岗，什么时候漏接了一根纱线？我们泡在车间的一线工人反倒下岗，他们大吃大喝，反倒是高薪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理？她又追着邓若兰问了一句：你说嘛，天底下还有没有这样的理？

慢慢地，邓若兰把她的话听明白了，把她俩的意思弄清楚了。她只觉得脚下越来越软，越来越没力气，大串大串的雨线从她的衣领，一直渗到背脊，她觉得手，也越来越冰凉，她的整个身子轻飘飘的，被她俩一拉一推，摇摇晃晃，随时都要摔倒。

邓若兰的身子一扭一扭，她的头一扭一扭，她的话也是一扭一扭的：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！她的话语把路两边的树也摇得一扭一扭的，把厂房的窗户也摇得一扭一扭的。

邓若兰说：就是因为那根纱线吗？就是慢了那一两步吗？邓若兰像是自言自语。那两位工友没听懂她的话，仍一拉一推，把邓若兰的身子推拉得一扭一扭。

邓若兰的车子一扭一扭，好不容易把她俩甩开，矮个子工友也不再拉了，指着公告栏上一张白色的纸，让邓若兰看。邓若兰不到两秒钟，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她才相信是真的。她把头上的白帽子抓在手，揉成一团，她把上嘴唇与下嘴唇也咬成了一团，她没有随另外两名工友往前走，而是扭过头，往回跑。

这时，雨竟停了，跑边的树叶被翻得哗哗作响，邓若兰把帽子抱在胸前，把一身青色的工作服挺直了起来，脚下的黑色平底布鞋像在碧波荡漾的湖水里航行的船，一翘一翘，摇荡着，向前。

两位工友三步并作两步，在后面追着，她们一边像鸭子拨着清波似的，一边冲着邓若兰喊：往哪走呢？厂长办公室在后边！

邓若兰好像没听见，仍是往前小跑，跑着跑着，哭声就甩出来了：厂长欺负人，不能因为一根纱线就这样欺负人。

两位工友都喊：邓若兰、邓若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

邓若兰说：我不要你们管。

两位工友把步子由三步并作两步，改成三步并作一步。高个子工友说：厂里把你开除了你还不管？矮个子工友说：我们不管，我们的饭碗一起完。

邓若兰抹了一把眼泪，回过头，在原地转圈。

高个子工友说：噫，你个邓若兰，吓蒙了不是？厂长办公室在那边。

矮个子工友冲上去拖邓若兰。邓若兰不随两人走，扶起电单车，把车头一扭，要往上骑。

矮个子工友把她扯了下来，说：去哪里？不去评理？

邓若兰不说话，掐了一把鼻涕，又转了两个圈，上了车，往厂外的方向走。

邓若兰走到厂门口，停下车子，朝厂里看了一下，又朝厂外看了一下，停了四五秒钟，掏出手机，说：妈，在家吗？我想去找你说说话！

邓若兰看到母亲的背影时，她母亲刘秋云正走在天桥上。邓若兰在马路的这一边锁好电单车，走上天桥，母亲那身青色的衣裤便闯进了她的眼帘。母亲的发髻像一座隆起的、骄傲的、坚实的小山包，她的步伐一颠一颠，身材饱满得一颤一颤，让邓若兰既熟悉又陌生。邓若兰看到母亲的脚下，一双黑色的鞋面随着她的双脚一抬一放，若隐若现。邓若兰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下，看着看着，鼻孔里的汁液又倒了出来，她狠狠地抽泣了一下，眼眶里的水却没能止住，冰凉凉地，渗了出来。

邓若兰一只手捂住眼睛和鼻子，冲上去，用另一只手夺母亲手臂上的菜篮子，母亲身子急急一扭，头猛地一侧，见是女儿，把脚步顿住，把眼睛瞪大：今天休息，不上班啦？邓若兰不回答，只盯着母亲的前身看，突然说：家里没黑色纽扣了吗？母亲低头，顺着女儿的目光，也盯着衣服说：掉了一颗，就再也找不着了，问了几家店也没卖了，想想也是，现在的商店，哪还有我们以前的工作服卖？我真是傻呆了，没法，只好钉颗白的。母亲宽宽的脸上泛起了笑意：不要紧吧？不难看就行。邓若兰摸着那颗乳白色的纽扣，说：好。母亲把笑意又漾开了一点，说：好什么好，你们新的工作服才好。母亲说完，抬起一只脚，轻轻地踢在女儿邓若兰眼前，又说：退休时的三双鞋，穿烂了两双，这双也洗得发白，起毛了。

邓若兰若有若无地“嗯”了两三声，又说：好。说完，把母亲搂紧，直到上了二楼。母亲打开家门，放下菜篮，系上围裙。邓若兰静静地看着，当母亲的前身围上那块白色的围裙时，邓若兰哇地哭出声来，说：妈，你以为是纺织车间呀？

中国纺织工人担负着满足人民衣着需要，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，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光荣任务。全体纺织工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总路线的红旗，高举不断革命的红旗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，不断改造自己，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技术水平，以冲天的革命干劲，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。

——《几句简单的话》·陈少敏·1959年

这本巴掌大的《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》，如今，仍躺在邓若兰母亲刘秋云的梳妆盒里，被梳子、发卡压着。本子的封面是浅绿色的，封面上的图是黑白的。图片上，一位纺织女工，戴着白帽子，白帽子是一朵比头更大的白云，把半头的发丝像薄雾一样，笼在里面。女工穿着短袖的花格衫，围着白色围裙，露出白藕一样的两截胳膊。刘秋云看不清她裤子的花色，图片上的裤子只是画成了几条竖线，与两旁的织布面卷起的风的样子一样。

刘秋云能感觉到这幅静止的照片中急速旋转的声音，她的耳边一片轰鸣。她知道，那是她生活的主旋律。

那名纺织女工，右手放在织布机的纱线上，左手轻轻抚着一捆织成的布面，微笑着。她的神情让刘秋云的脸上也有了微笑。这时，刘秋云觉得那个女工就是自己。

刘秋云每天都把这种微笑写在面前的镜子里，窗外的晨光像柔软而洁白的布面，滑进房间来。躺在床上的邓若兰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在她心里，那一缕缕微笑，那一缕缕晨光，就是母亲的全部，也是她未来的全部，她渴望这一天快快到来。她知道，母亲可能也希望那一天来到。母亲踮脚，轻盈地闪出房间后，邓若兰还笼罩在一片白色的、光滑的童话里。

记忆中，邓若兰自懂事起，就认为母亲是位细腻聪明、勤勉能干的女人。细腻聪明、勤勉能干这样的词语，用在纺织女工的身上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很小的时候，邓若兰看到母亲刘秋云在暗黄的灯光下，用几根金钢针、一团绒线，双手上下翻飞，纺出各种美丽图案的针织品，把她和父亲，还有自己，打扮得清爽宜人，包裹得温暖舒适。

母亲在灯下的那副端庄怡人、从容贤淑的神态，成了邓若兰童年里又一帧美丽的图片。

邓若兰的童年，很少见到父亲。父亲在地质队工作，长年累月，奔波在

野地。每次回来，父亲像探看新娘一样兴奋，邓若兰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满脸竟是绯红。母亲很少问他在外面如何如何，只是捧出在父亲外出的时间里她编织的小背心、小绒线裤，一件件，抖开来，像云儿一样，铺在父亲的身上，比画着，测量着，用父亲的话说，比地质队出身的他还细心的样子。

邓若兰曾问母亲：你爱父亲吗？刘秋云轻轻点了一下邓若兰的头，说：傻丫头，不爱有你吗？邓若兰又问：你不怕父亲跑掉吗？母亲停下手中的活，说：你将来懂得织毛衣就晓得了。邓若兰眼睛瞪得大大的：跟织毛衣有什么关系呀？母亲刘秋云说：织毛衣，最要紧的是，要掌握绒线的松紧度，紧了，针织品会板结，不柔软；松了，就稀拉，没章法，不暖和。母亲刘秋云摩挲着手中的毛线衣，声音像线绒那么软、那么细：松紧度适应的针织品，才既平整大方，又柔软舒展。我和你爸也是一样，太近了，绊脚，太远了，怕分离。母亲刘秋云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拉好手中的线，不松不紧，不远不近，方能不离不弃，懂吗？

六岁的邓若兰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她仰起头，在邓若兰的眼里，全是母亲刘秋云。在邓若兰的眼里，母亲刘秋云就是她的衣食住行，母亲刘秋云就是家，就是她心里的全部。她没见母亲求过别人家做过什么事，即使是父亲在家的時候，她也没听到母亲说，要父亲做什么。

那时的母亲刘秋云已是在市纺织厂工作七年的女工了。

刘秋云有时会把邓若兰带到厂里，那是邓若兰感到最奇妙、最自由的时间。奇妙的是，厂里的轰响，在邓若兰听来，像悦耳的音乐，丝毫没有烦躁的感觉，而是蹦蹦跳跳，把母亲刘秋云的手也晃得麻滋滋地生疼。

邓若兰觉得母亲刘秋云天生就是做纺织女工的料，她想，母亲双手，连针织都能做，还不能守着自动化机器做吗？——当然，这是邓若兰长到十几岁时的想法。那时，她看到母亲轻快的脚步，突然这样想。她这样一想，突然又觉得有点小残酷。因为，她也看到了母亲脚步没有轻快的时候，她也看到了母亲回到家捶着腰和背的时候，这时，她就希望母亲的厂里停电，永远地停电。

邓若兰跟母亲去厂里时，真的遇到了几次停电。停电，其实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纺织厂经常发生的事。邓若兰记得，那时大人不叫“停电”，而是说“避峰”，它一般在上中班的时候发生。特别是夏季的傍晚，到用电高峰时，轰鸣的纺织机，像一群突然坠落的大鸟，因停电戛然而止。

这时，邓若兰往往蹲在厂房外的花圃边玩，一直嗡嗡的声音像突然被掐了一下，断了，邓若兰往往会突然侧起耳朵，才知道，整个车间一片寂静和朦胧。接着，她马上能听到女工们的叫喊声。邓若兰拼命地往厂房里跑，她听到那些叫喊声，回荡在车间宽大的空中，还有一些叔叔，用纺管敲打铁皮箱，传出呼呼嘭嘭的声响，仿佛是一种宣泄或者是短暂的呼气。

车间里的高温，让每个人的衣衫都湿透了，大家还在叫喊，她们一边叫喊，一边冲出车间，在空旷的地上乘凉。遇到晚上停电，抬头看暮色的夜空，星星若隐若现，草丛里，萤火虫儿飞舞，这时，刘秋云便靠在墙根上，让脸微微仰起来，迎着轻轻吹来的风儿，脸上的每一抹光泽都在与夜风摩挲，像抚摸每一根纱线，每一寸布。她听到了那种摩挲的沙沙声，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响起，她的脸亮亮的，是被她的眼睛点亮的，她耳畔听到了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，她的心花，在夏夜里，在女工们带着汗味的迷人气息里，默默绽放。

邓若兰更多的时候，是看到母亲在车间里忙碌的情景。对三班制的工作，刘秋云是深有体会的，她不停地在车弄里来回走动，纱线断了，要灵巧地接上；纱管满了，要飞快地一手拔下满绽的纱管，一手插上空纱管；粗纱没了，要通知扛纱工，扛纱工要肩扛着沉重的粗纱筒，高高举起，放到纺纱机的顶上；纺车坏了，要跟班机修工及时修理好。刘秋云的车间有一百多部纺纱机，一百五十多个工人，她们分工明确，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。一百多台纺纱机的热量，使整个车间像个大蒸笼，温度常常达到四五十摄氏度，降温的设施只有从外面运来数十斤重的大冰块，放在木盒里，安置在车间的各个角落。

那时候，刘秋云清楚地记得，一休息时，人手一本《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》。车间主任组织她们学习本子里的织布工作法，比如如何巡回、如何检查布面、如何检查经轴、如何检查机械和停台方法，等等。刘秋云看着主任大声地念着本子里的文字，她把那本子夹在她的手掌上，她能背得出那些文字，好像每个字就是一根纱线，她每天抚摸它们，看着它们，从她的眼前，像光阴般穿梭往复。

后来，刘秋云把那小本子放进了梳妆盒里，梳妆盒表面，慢慢起了皱纹，她的脸，也慢慢爬上了皱纹。邓若兰说：妈，你该歇歇了，我来接你的班吧。刘秋云摸着女儿邓若兰那双长长的、纤细的、白白的手说：你也就是只能吃这门饭……

门关着，没有锁。柔软的绸被，一铺一折，成了节气的实物标本。主人说：采桑去。养蚕去。织绮去。她看着她进门的姿势，像孔雀开屏。她对自己说：还有没有开始？天地有大美，水落石不出，丝丝缕缕，只是往日的记忆，而已……

直到母亲刘秋云喊邓若兰到厨房里去端蛋花西红柿汤，邓若兰才真正抑制不住，又一次哭出声来。刘秋云转过身，看到女儿邓若兰双手揉搓着那顶白帽子，满脸都是泪花儿，湿漉漉，发着光。刘秋云说问：兰，你今天怎么啦？说着，她的脚步紧紧地牵到女儿面前去。

邓若兰扑在母亲怀里，哽着声音，说：我就是想当个纺织工人，我一直在努力地工作，像你一样地努力工作，我也不比别人落后，我甚至比很多人要先进，可为什么要我下岗？刘秋云一听，把目光慢慢地定在对面的墙壁上，一动也不动。许久，她才说：不关你比别人落后不落后的事。邓若兰擦了一下母亲的手背，那上面，滴着她的泪。邓若兰的头仍低着：那是为什么？刘秋云说：碰上你了。刘秋云把女儿推到饭桌边，又说：现在的事呀，人与人，比不得。

邓若兰说：连你也不站在我这边。刘秋云说：我站在你这边有什么用？当初我让你去考大学，你不是不去？你不是非嚷着要顶我去纺织厂？说着，她在女儿邓若兰的肩上拍了两下，说：下午我就去跟厂长说说？停了三秒钟，她又说：唉，不知厂长还认不认得我这张老脸，我在厂里的时候，他是车间主任。邓若兰说：妈，我知道，你千个不愿万个不愿，你还是不要去了，现在是我的事了，不该叫你管。刘秋云说：了解你妈就好。说完，她叹了口气，脸上拧起了几丝笑意，又拍了邓若兰的肩上两下，说：明天我给你织一条披肩，一米的，白色的，上面织花的，一片一片，翻起花瓣，保证好看。

邓若兰仍盯着墙壁，目光定定：为什么厂长刚好经过那里？为什么恰恰断了一根纱线呢？刘秋云说：不是那根线的事，不关那根线的事。邓若兰说：那我以后怎么办呢？刘秋云说：那能怎么办？找其他事做，找其他工作。邓若兰说：除了纺纱织布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刘秋云说：你妈做了一辈子的纺织女工，天天盯着那根纱线，很快就走完了。你也要学你妈，除了纺纱织布，就不会其他？邓若兰说：我喜欢几百号人在同一个车间的热闹，我喜欢机械嗡嗡的喧嚣，我喜欢大集体企业的荣耀。刘秋云说：那是因为你只走了一条路。刘秋云把女儿按在凳子上，又说：先吃饭吧。